

李秀成的狱中表现应当怎样评价？

王 亚 朴

六十年代，戚本禹抛出了黑文《评李秀成自述》，给李秀成戴上了“叛徒”的帽子，李秀成被俘前的历史也跟着翻了个筋儿，“孤寒无食、种地耕山、帮工就食”的李秀成参加太平军，变成了“投机革命”；跟随洪秀全南征北战，立下伟大功勋，变成了“对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，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”，李秀成的功劳完全不见了，李秀成的是非功过成了一片混乱。

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拨乱反正、正本清源的时候到来了。凡是被搞乱了的问题，都要解放思想、冲破禁区、重新评价。李华兴、罗孟楚同志在《文汇报》学术副刊分别写了《重评李秀成》、《李秀成不是叛徒》，把李秀成被颠倒了的历史，重新颠倒过来，给他摘掉“叛徒”的帽子，让他回到农民革命队伍，成为其中一员，这符合历史实际，实事求是。

过去，政治斗争代替了学术讨论，李秀成方山被俘后的评价简单化，导致了对李秀成的全盘否定。现在，我们应当对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。李秀成方山被俘后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“自述”，他自己却得了一个被杀头的结果。我们应当怎样看？把李秀成打成“叛徒”，一棍子打死，否定一切，违背太平天国的历史；把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全盘肯定，甚至把他的错误也当成正确，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
李秀成的“自述”是真是假？罗尔纲先生说，不能否认《稿本》的真实性；荣孟源先生说：“是曾国藩删改后又找人誊录的抄件”。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·艾黎也提出李写的东西是“有关起义的历史”，而现有的是曾国藩

“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的东西”。《自述》的性质如何？有人说它是“自白书”；有人说它是“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”。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如何？是好是坏？现在有人说李秀成“不是叛徒”；有人说他“动摇变节”；有人说他“经受了酷刑的考验”是“狱中的英雄”；有人说李秀成被俘后，是一个向敌人示弱乞降的人物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只有根据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加以鉴别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

李秀成被害的第二天，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的日记中说：“中堂嘱余看李秀成供，改定咨送军机处。”“自述”经过删改，肯定无疑。不过，“自述”内容，真假可辨；李秀成的表现，还有另外一些史料，好坏可分。我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从实际出发，提些看法，和罗孟楚同志商榷。

李秀成的狱中表现，究竟是英雄无畏，还是示弱乞降？

李华兴同志在《重评李秀成》中说：“一八六四年七月李秀成被俘后，在敌人囚笼中确实写了几万字的供词”，“临危辱节，没有把忠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气节坚持到底。”罗孟楚同志在《忠王李秀成不是叛徒》中则说：“李秀成经受了酷刑的考验”，“英雄无畏”，并要求“割掉李秀成动摇变节的尾巴，给李秀成彻底平反。”

罗孟楚同志引了赵烈文的日记，证明李秀成在刀锥加身，死亡临头之际，声色不动。并且说“即使拿今天的无产阶级标准来看，也是英雄无畏的。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

刺臂割股，“忠首殊不动”；临刑，“作绝命词”，“叙其尽忠之意”（上引皆赵烈文语），

事属可信,无庸怀疑。这里需要研究的是:这一表现是不是事物的全部或本质。

就在李秀成遭到曾国藩刑讯的当晚,赵烈文和李秀成谈了话,在谈话中,李秀成说了“死耳”的话。罗孟楚同志解释说“死耳”,“就是一死而已”。事实并非如此。革命英雄,临危不惧,就义而已!可是李秀成说了“死耳”以后,却还要饶舌。他说:“顾至江右者皆旧部,得以尺书遣散之,免戕彼此之命,则瞑目无憾。”他是说,我死是可以的,就是难以瞑目。要我闭眼而死,需要我写信把旧部遣散以后。俗话说“会说的不如会听的”,李秀成说得虽好,赵烈文却听出了话头,那就是“言次有乞活之意。”所以赵烈文一句话——“汝罪大,当听中旨!”——李秀成就“俯首无语”。

罗孟楚同志说,初审和被害时李秀成的无畏表现才是本质。其实李秀成自己心中有数,象他这样一个屡败湘军,几次逼得曾国藩寻死的人,一旦落到对头之手,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。刀枪,李秀成见多了,刀锥置于地,臂上刺一下,股上割一刀,他是不在乎的,行刑,吓不倒李秀成,他担心的是对他最后的处理。这就是为什么“叱勇割其臂股,皆流血,忠首殊不动,而一声“汝罪大,当听中旨”却使李秀成低下头来的原因。太平天国革命,光明伟大,有何可低头之处!

那么,李被害时的表现就是写了“绝命词”以叙“尽忠”之意吗?不然。罗孟楚同志所引赵烈文日记还反映了另外一个方面。当曾国藩派幕僚李眉生通知李秀成“国法难违,不能开脱”的时候,李并没有立即写“绝命词”。他还是向他的对头人说好话:“中堂厚德,铭刻不忘,今世已误,来生愿图报。”直到“傍晚赴市”要行刑了,杀头在即,再无缓刑可能了,李才作“绝命词”。赵烈文这个曾国藩的走狗,十句绝命词不记,对曾国藩感恩的话全录,让我们无法确切判断。可是,有此事还是可以相信的。那么,堂堂忠王,对死对头感恩戴德,悔恨“今世已误”,发誓“来生愿图报”,又

怎么能同时对太平天国“尽忠”呢?初刑以后,李秀成过的并不是酷刑有加,刑讯不止,欲死不能,使他非招供不可的日子。他得到的是“承德宽刑”“恩给饭茶足食”。这样的情况下,李不是坚决和敌人作英勇的斗争,而是说了大量表现苦闷、悔恨、颂敌的话。什么“押在罪囚,尚未刑治,我闷闷于囚”啊,“今已被拿,本应早日诛刑,承蒙迟究,感戴靡涯”啊,“今韦志俊生命投入清朝,而得回家之乐”啊,等等。请看:被囚就“闷闷”,“迟究”就“感戴”,想到别人投降,就记起回家之乐。对此种表现,视之为“英雄无畏”甚至达到了“今天无产阶级标准”未免誉不符实。

不仅如此,李秀成还乞求投降哩?有言为证。他说:“我不过在秦为秦,在楚为楚”,“楚肯容人,亦而死报。”翻译一下就是:我李秀成过去忠于太平天国,曾家如果肯用我,我也愿意以死相报。李秀成死的当天,还在写《自述》,他写完“招降十要”以后,又写了以下的话:“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,承恩惠示,真报无由。罪将一身屈错,未逢良明,今见老中堂恩广,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,酬报昨夜深惠厚情,死而足愿,欢乐归阴。”写这些话的时候,李秀成还不知道当日已临死期。他还向曾贼表白:他跟洪秀全是“未逢良明”,跟错了人;昨天夜里曾贼亲讯一次,他就下定了决心“定要先行靖一方,酬报昨夜深惠厚情”,并且表示,办了这件事,他就“死而足愿,欢乐归阴”了。罗孟楚同志认为“死而足愿,欢乐归阴”说明李秀成坚贞不屈,视死如归。实际上李说的这个“足愿”,是指“先行靖一方”,没有这个“足愿”也就没有“欢乐”,并非表示为了太平天国的大业,一死而已!这都说明“写绝命词”并不是李秀成狱中表现的全部和本质。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!”当年文天祥被俘,纸墨摆在面前,坚决拒绝写信招降正在海上坚决抵抗元军的张世杰,写出了义正辞严,流芳百世的《正气歌》,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,为后人所称颂。李

秀成恰恰相反，主动要求招降旧部，自己屈了膝，还要别人来投降，临死还要对曾大人感恩戴德，直到真正要杀头，才写“绝命书”，这怎么能算“经受了酷刑的考验”，“狱中的英雄”呢？实践说明：李秀成在狱中主要是一个向敌人示弱乞降的人物。

《自述》究竟是“经验总结” 还是“自白书”？

罗孟楚同志引证了革命导师列宁的话：“判断一个人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，而是根据他的行动”。这话引得好。看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，也要看他的行动。那么，李秀成被俘后的行动是什么？写《自述》。谓予不信，请看自白：“纸尽情长，言不了完，烦列位师爷交簿一本，交好笔一支，此笔坏了，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，笔坏不能，烦各位师爷转禀中堂及中丞大人宽限，我亦赶写。”事实证明，李被俘的十几天，每天最主要的行动就是用笔写，那以后他又把《自述》写到五六万字。

李秀成《自述》洋洋五六万字，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太平天国革命史料。李秀成说：“速将纸笔来，吾当书之，吾史馆实录，为尔曹焚掠尽，吾不述，奚以传后？”从《自述》实际内容看，不能忽视李秀成十几天狱中生活给我们留下的这笔“财富”。不能因人废言，要古为今用。有些话，如“天朝十误”，语重心长，今天我们也可借鉴。

同样，不能否认，李在《自述》中，确实有大量“自白”、“谏敌”、“乞降”的话。他一面写太平天国的历史，写自己的战斗活动，一面自己又加以否定和抹黑。而这样干，是他自愿的。他说：“当承讯问，我实的未及详明，自行甘愿，还细写清白呈请老中堂玉鉴。”要是只因“吾史馆实录，为尔曹焚掠尽”而写太平天国史，决不要什么“自白”之类的东西，更用不到“呈老中堂玉鉴”，并声明“未隐瞒半分”。

《自述》写了战绩、历史、经验教训，但是交织着忏悔、自白、乞求和阿谀逢迎。成

了一种精华与糟粕混和的大杂烩。拜上帝、斩妖魔、参加太平军，成为“迷迷蒙蒙”而来；战顽敌、保天国，又成了“骑上虎背，不得不由”。死对头、刽子手幻化为“恩德巍峨，全邦幸福”的高大形象；天京失陷，竟成了拍马的话题。什么“得此城而威扬天下，实中堂之谋，九帅之算，将相用命，而成全功也！”《自述》又成了李秀成乞降的进见礼。李秀成在这份《自述》中，用尽了他能够收集到的吹捧之词，都做为桂冠戴到曾贼头上。即便这样，还怕犯了曾贼忌讳，他哀求“各位师爷劳心，将前部鉴对，凑合成全，好呈中堂玉鉴，中丞大人惠览。恐有忌讳字样，亦烦改除。”杀头，无疑是一件大事，不过说了以上一些话，再讲讨太平天国“尽忠”，写“绝命词”，就不使人那么郑重以待了。

罗孟楚同志说，李秀成忏悔自己的过去，“全是自我检查之辞”。我们不敢苟同。“自我检查”，一名自我批评，加上批评，是革命队伍和人民内部实行的一种自我教育方法。自古至今那有向敌人作“自我检查”之理？向敌人认错，就是自白、自首和投降。李秀成既有功于前，又被杀头于后，戴上“叛徒”帽子，否定一切，不能令人信服；原諒一切，披上“自我检查”外衣，也难服众人之心。如果硬说李被俘后的行动是“革命”的，那只好称之为“跪着革命”了。

李秀成是不是假投降？

假投降是不是正确？

天京被围，危在旦夕。忠王李秀成统观战局，认为不应该坐守孤城，向洪秀全提出了“让城别走”的谏议。即使现在看来，也是真知灼见的主张。洪秀全晚年保守猜疑，以忠谏为异心，不采忠王谏议。战局的发展，不幸为李秀成言中。天京陷落，李秀成被俘。昨日驰骋战场的英雄，今天成为任人宰割的囚徒。一日之变，天地反复。李秀成感慨万千、思绪起伏，是可想而知的。“苦肉计”、“缓兵计”、“假投降”、“各扶其主，各尽其忠”、“在秦为秦，在楚为楚”、“大丈夫能屈

能伸”，等等思想都会涌现在他的脑海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决计来个假投降不是不可能的。范文澜同志在《中国近代史》中说：“李秀成表示向曾国藩投降，自然不是象反动统治者所说的‘宛转求生，乞贷一命’；而是想争取曾国藩的庇护，保存数十万太平军残余革命力量，逐渐分化曾国藩与满清的关系，等待时机的到来，再度进行反满反外国侵略。”罗孟楚同志也是以这种假说来做为论证的。

历史的发展，只能让我们进行这种分析，进行这种假定。历史实践，又消除了证明和肯定这种假说的任何可能。曾国藩这个老奸巨猾、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视李秀成为大患，既惧其“狡黠”，不使其入京；又畏其“凶猛”，不使其“归山”。待李秀成写完“招降十要”、“天朝十误”以后，就把他杀了。没让他有任何别的行动来证明他是真降或假降。

但是，问题既不在李秀成会不会假投降，也不在历史上有没有假投降。问题在于即使是假投降，李秀成这么做对不对。回答只能是否定的。这是因为：一来不可能；二来代价太大，不应该！

曾国藩是个奸猾著称的人，非等闲之辈。你有千条妙计，他有牢牢主意。他是不上你那个当的。他深深知道，不要说如果李是假降会使他人头落地；即使李是真降，他的虚报冒领、内部矛盾，日后一旦被李秀成捅开，他也要丢官罢职的。对曾国藩来说，取得了你李秀成招降的真凭实据以后，杀为上策。这就是既杀了李秀成，又做假奏章的道理。

李秀成这么做，代价太大了。污自己、谗敌人、乞投降、跪破了膝盖，丢尽了脸皮，遭笑万年，落了个“竹篮子打水一场空”。是非忠奸，留下个让人千古议论的话题。代价之大，无法补偿。“乞降”也罢，“乞活”也罢，或者“乞降不是乞活”也罢，李秀成虽得到了“免于凌迟”，却依然杀头问斩。这是血的也

是铁的事实，不容否认或改变。而太平天国旧部李世贤、汪海洋，幸亏没有得到李秀成乞求的生命保护，反得坚持战斗下去。这对革命人民也是一个血腥的惨痛的教训！

张献忠谷城投降，不能成为李秀成可以搞假投降的理由。张献忠当时手下还有几万人马，号称十万，进退还可以有点作为。李秀成身陷囹圄，任人宰割，并无一兵一卒，要张纸也要求师爷。这是条件不同。更重要的是，张献忠所为，并不足为训。高迎祥战死，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，但是他坚信未来，高举义旗，息兵深山，等待时机，东山再起。张献忠则临危动摇，投机取巧，寄人篱下，挨骂受气。张献忠自己也悔恨其所为，以后重新起义，去洗刷他伪降的污点。而李秀成做尽了自污和谗敌的事，仍未免一死，连重新起义的机会也没有捞到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。何况，假降与真降之间，并没有一条深不可逾的鸿沟。假降常常是真降的障眼法。所以假投降之事虽有，但仍需予以批判。

“时穷节乃现，一一垂丹青。”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，英雄辈出，何止文天祥所举数人。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、革命人物比比皆是。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、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。它坚持战斗了十四年，势力发展到十八省，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，它的光辉业绩千古不朽；在中国历史上，谁建立了功勋，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，包括李秀成这个有功于太平天国革命的人物在内。但是，李秀成在敌人囚笼中长出的那条污黑的尾巴——自污、谗敌、乞降，还是让它长着教育人们吧，这样就可以从太平天国引出应有的教训，用不着割去本有的尾巴，硬去增加李秀成的光彩。